

国家认同及其变迁：宏观与微观的跨国比较分析

马得勇 陆屹洲*

【内容提要】 本文利用社会调查数据和统计数据，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对国家认同进行了实证分析。根据分析结果，国家认同在各个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文化、宗教圈的分布差异较大。进一步分析后发现，相较于民主制度绩效、政治信任等政治因素，宗教文化以及心理因素对国家认同具有更为重要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往往受到宏观的结构性因素和情境的制约。本文对“全球化导致国家认同退化”“民主化和提高治理绩效有助于国家认同的建构”等观点提出质疑，并通过实证分析澄清了一些对国家认同的错误认识。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对于一个努力实现经济社会现代化和政治文明的国家，国家认同的衰退很可能不可避免。

【关键词】 国家认同 全球化 族群分化 宗教 威权人格

当今世界大部分国家属于多民族、多文化构成的国家。作为个体内在的一种社会心理、态度和情感，同时作为一种主要的社会认同形式，国家认同在国家建构、政府政策制定、族群关系等众多领域被认为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从国外学界对国家认同的研究现状来看，无论是理论层面的阐释还是实证层面的分析，均有大量成果涌现。从国内研究现状来看，基于历史和思想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相关理论研究数量众多，基于田野调查基础上的质性的、案例性的研究也层出不穷，但是基于量化的、跨国的比较研究数量并不多见。不仅如此，笔者阅读这些研究成果后发现，国内学者对于国家认同及其现实状况的了解存在诸多偏差、

* 马得勇，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陆屹洲，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误解甚至错误的认识。为此, 本文将以跨国性社会调查为基础, 对国家认同的全球分布状况、宏观、微观层面的成因进行初步的探索性分析, 以澄清国内对国家认同问题的若干错误认识, 并尝试为国内相关领域的后续研究提供基础和拓展视野。

一 研究回顾

(一) 国家认同的内涵和意义

由于国家、民族、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等在现实中的错综复杂, 加之中文和外文在译法上的困难以及不同国家的人们在日常语言使用上的差异, 对相关概念的界定在学界并不清晰, 甚至可以说相当混乱。按照学界不同学者对相关概念的使用, 出现了一种令人困惑的现象: 即, 民族 (nation) 并不等同于国家, 但常常被用于指称国家 (state 或 country); 民族 (nation) 并不等同于族群 (ethnic group), 但常常被指称族群, 尤其在国内; 民族主义 (nationalism) 也不等同于国家主义 (statism) 但常常被指称国家主义; 民族认同 (national identity) 常常被用于指称个体对某一族群的认同, 但也常常被用于指称个体对国家的认同 (national identity 或 country identity)。在本文中, 我们并不打算就这些含义含混不清、使用混乱的概念进行学理上的梳理, 而是对本文所使用的概念作一界定, 随即展开后续的经验分析。

在本文中使用的国家认同 (national identity) 指个体“归属于国家 (nation) 的主观或内在的感受”^①, 这种感受可以被理解为个体对国家所持有的一种心理状态、情感或态度。这里的国家认同并不指称个体对某一民族 (nation) 的认同, 它暗示着我国与“他者” (others) 的区分。国家认同不仅意味着国家内部成员的共同特征, 也意味着国家内部成员和外部群体的不同之处。因此, 只有通过和“他者”的比较, 国家认同这一术语才有意义。^②

一般认为, 国家认同在整体层面体现为不同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个性特征, 在个体层面则体现为公民所具有的一种可观测的政治倾向。^③ 国家认同因形成原因和表现形式不同, 往往展现出不同的面目, 它既有可能表现为排外的、破坏性

① Leonie Huddy and Nadia Khatib, “American Patriotism, National Identity, and Political Involve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1, no. 1, 2007, pp. 63–77.

② Anna Triandafyllidou,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Other’,”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 21, no. 4, 1998, pp. 593–612.

③ 林震:《论台湾民主化进程中的国家认同问题》,《台湾研究集刊》2011年第2期,第67页。

的、病态的民族主义，也有可能产生积极的、建设性的、健康的爱国主义^①，既可以基于对民族共享的价值、情感、记忆、神话和象征而形成的族群性国家认同（ethnic national identity），也可能基于对共同的政治体制、政治价值和政策的认同而形成的公民性国家认同（civic national identity）。^② 这也可以理解为国家认同的两个维度，即：先赋性的（ascriptive/objectivist）维度和公民性的（civic/voluntarist）维度。^③ 同时，国家认同也可能是多种认同交互作用的产物，包括政治制度认同、经济利益认同、文化心理认同等多个维度。^④ 从政治制度的维度来说，国家认同源于制度设计及其背后政治理念对公民的吸引力。这一点在新生政权中尤其明显，只有吸引最广泛认同的政治理念和政治组织才能在国家权力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从经济利益的维度来说，国家认同源于国家能够切实给予公民的经济利益。这本质上是一种理性选择下的交换：国家给予公民庇护，公民则承认国家的合法性。不难发现，这种经济利益上的国家认同为独裁和专制提供了自我辩护的基础。^⑤ 从文化心理的维度来说，国家认同并不是公民当下选择的结果，而是历史、宗教、语言、文化、符号等因素长时段浸润下的产物^⑥，是一种“集体性的文化现象”^⑦。因此，文化心理维度上的国家认同源于个体对主流文化、信念的认可和热爱。^⑧

（二）国家认同的影响因素

如上文所言，国家认同是一个复杂的集合概念。民族国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汲取个体的认同，而个体也可以对民族国家的不同维度表达不同程度的认同。因此，作为整体的国家认同也有着不同方面的影响因素。

1. 政治制度

既有理论研究认为，人民是当代国家的建构主体，也是政治权力的唯一来源

① Daniel Druckman, "Nationalism, Patriotism, and Group Loyalty: A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38, no. 1, 1994, pp. 43–68.

② 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版。

③ Frank Jones and Philip Smith, "Diversity and Commonality in National Identities: An Exploratory Analysis of Cross-national Patterns,"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37, no. 1, 2001, pp. 45–63.

④ 王卓君、何华玲：《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认同：危机与重构》，《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第18页。

⑤ Anthony D. Smith, *National Identity*, Reno: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1991, p. 16.

⑥ 黄卫星、张玉能：《互联网语境下的文化记忆与国家认同》，《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第12页。

⑦ Anthony D. Smith, *National Identity*, p. i.

⑧ 马得勇：《国家认同、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近期国外实证研究综述》，《世界民族》2012年第3期，第9页。

源。因此,就国家层面而言,民主是国家认同的前提。^① 公民没有理由去认同一个不民主的国家。何包钢进一步认为,民主治理是解决国家认同的一种有效手段,而不是解决国家认同的障碍,非民主制度实际上助长了分离主义,而民主条件下或者以民主的方式处理少数族裔的政治权利和政治参与诉求时,分离主义的势力会被有效地削弱。^② 然而,随着民主的不断发展,被代理的公共权力又回到了大多数人乃至全体成员的手中,那么作为统治工具的国家逐渐失去了必要性,国家认同也随之消解。^③ 除了国家整体的民主程度,个体对于国家的政治制度及政治理念也会有自己的感知和评判,进而产生不同程度的国家认同。实证研究表明,个体的国家认同与民主状况、政府质量、政治信任等政治评价之间都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④ 也有实证结果表明,政治信任和公民性国家认同呈正相关,而和族群性国家认同呈负相关。^⑤ 针对美国的个案研究表明,民主制度的衰败、政治评价的下滑和国家认同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同步发生的。^⑥ 另有实证结果表明,就国家间的比较而言,民主程度和族群性国家认同存在负相关而与公民性国家认同正相关。^⑦ 可见,国家认同与政治因素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值得进一步研究。

2. 经济利益

关于经济因素对国家认同的影响,既有文献明显地分成两种观点。一方面,庇护关系理论认为,资源的占有者向个人和群体施以恩惠,而受惠者则向施惠者回报以忠诚和服从。^⑧ 因此,国家经济发展越好、个体分得红利越多,其回报给国家的认同就应该越多。另一方面,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理论则认为,在物质相对匮乏的时候,人们倾向于依赖国家来寻求安全感,所以会表现出强烈的国家认同;而当人们对富裕生活习以为常的时候,自我表达的重要性将逐渐高过国家认

① 林尚立:《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政治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第28页。

② Baogang He, "The National Identity Problem and Democratization: Rustow's Theory of Sequence,"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vol. 36, no. 1, 2003, pp. 97-119.

③ 李崇富:《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和国家认同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第8页。

④ 王衡:《国家认同、民主观念与政治信任——基于香港的实证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5年第5期,第157页。

⑤ Linda Berg and Mikael Hjerm, "National Identity and Political Trust," *Perspectives on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 11, no. 4, 2010, pp. 390-407.

⑥ 谢韬:《美国国家认同的危机——民主、种族和霸权的视角》,《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12期,第43—46页。

⑦ Robert M. Kunovich, "The Sources and Consequences of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74, no. 4, 2009, pp. 573-593.

⑧ 陈尧:《庇护关系:一种政治交换的模式》,《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第22—23页。

同,个体的国家自豪感也会有所降低。^①因此,国家经济发展越好,个体生活水平越高,国家认同就会越低。历史数据表明,西欧等发达工业社会的发展情况印证了经济发展对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负面影响。^②而微观层面的实证研究也大多支持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理论,即个体的收入水平和其国家认同感呈现负相关关系。^③不过,也有实证结果显示收入情况对与国家认同相关的政治倾向的影响在不同群体中并不稳健。^④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似乎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理论的一个反例:美国是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但美国公民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都在世界范围内名列前茅。^⑤

3. 文化心理

如果将国家认同视为一种集体性的文化现象,那么拥有不同语言文字、不同历史渊源、不同宗教信仰的不同国家必然会孕育出拥有不同文化内核的国家认同。一般认为,世界政治中现实存在着差异明显的不同“文明”(civilization)^⑥或“文化圈”(cultural zone)^⑦。从宏观层面而言,不同的文明属性和宗教信仰可以通过确认彼此间的不同来动员文明内部的国家认同,这一点在战争和冲突期间尤其明显。^⑧微观层面的实证研究也发现,传统文化^⑨和宗教信仰^⑩对个体的国家认同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认同”指向“心理认识上的一致性和由此形成的社会关系”^⑪,本质上是一种心理动机和心理历程。^⑫因此除了显性的文化归属,内在的人格特质等心理学因素也会影响个体的国家认同。实证研究

① 罗纳德·英格格哈特:《现代化与后现代化43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严挺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49页。

② 罗纳德·英格格哈特:《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张秀琴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15页。

③ 李春玲、刘森林:《国家认同的影响因素及其代际特征差异——基于2013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第145页。

④ 参见马得勇:《中国网民的意识形态立场及其形成——一个实证分析》,《社会》2015年第5期,第159、161页。

⑤ Minxin Pei, “The Paradoxes of American Nationalism,” *Foreign Policy*, no. 136, 2003, pp. 31–37.

⑥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

⑦ Ronald Inglehart and Christian Welzel,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Democracy: The Human Development Sequ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48–76.

⑧ Pippa Norris and Ronald Inglehart, *Sacred and Secular: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the Muslim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118.

⑨ 金炜玲:《亚洲青年国家认同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2003年亚洲大学生价值观调查数据》,《中国青年研究》2018年第3期,第63页。

⑩ Robert M. Kunovich, “The Sources and Consequences of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74, no. 4, 2009, pp. 573–593.

⑪ 詹小美、王仕民:《文化认同视域下的政治认同》,《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第27页。

⑫ 赵志裕、温静、谭俭邦:《社会认同的基本心理历程》,《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5期,第202页。

表明,威权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高的个体会表现出更为强硬和保守的意识形态立场^①,而这种立场又往往预示着强烈的国家认同。^②此外,还有很多的人格特质能够预示个体的意识形态立场和其他政治态度^③,这些心理因素与国家认同间的关系值得进一步考察。

4. 其他共同体

在当代世界中,民族国家并不是个体归属的唯一共同体。类似于国家认同的形成过程,个体也有可能从政治制度、经济利益、文化心理等不同维度对其他共同体产生认同,而这些认同很有可能和国家认同产生交集。因此,次国家共同体和超国家共同体都有可能对国家认同产生影响。一方面,对于民族国家而言,“族”和“国”之间始终存在着一定的张力和矛盾。^④既有的理论研究认为,当代世界政治中,民族身份进入了本该属于公民身份的公共领域,进而导致国家认同危机。^⑤实证结果表明,在某国的支配民族中,个体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呈现正相关关系;而在从属族民族中,个体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呈现负相关关系。^⑥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国家认同还面临着来自超国家共同体的冲击。对欧洲民众的研究表明,个体的国家认同和其对欧盟的支持态度呈负相关关系。^⑦但既有研究同时表明,个体的国家认同和国际主义倾向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⑧,而全球化对民众的政治自豪感也没有显著影响。^⑨综

① 参见马得勇:《中国网民的意识形态立场及其形成——一个实证分析》,《社会》2015年第5期,第163页。

② Robert M. Kunovich, “The Sources and Consequences of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74, no. 4, 2009, pp. 573–593.

③ John T. Jost et al., “Political Conservatism as Motivated Social Cognition,” *Psychological Bulletin*, vol. 129, no. 3, 2003, pp. 339–375; John T. Jost, Brian A. Nosek and Samuel D. Gosling, “Ideology: Its Resurgence in Social, Personality, and Political Psychology,”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vol. 3, no. 2, 2010, pp. 126–136.

④ 周平:《民族国家认同构建的逻辑》,《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2期,第10页。

⑤ 周光辉、刘向东:《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的国家认同危机及治理》,《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第47页。

⑥ Jim Sidnius et al., “The Interface between Ethnic and National Attachment: Ethnic Pluralism or Ethnic Dominanc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61, 1997, pp. 103–104.

⑦ Sean Carey, “Undivided Loyalties: Is National Identity an Obstacle to European Integration?” *European Union Politics*, vol. 3, no. 4, 2002, pp. 387–413.

⑧ Minoru Karasawa, “Patriotism,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ism among Japanese Citizens: An Etic-Emic Approach,”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23, no. 4, 2002, pp. 645–666; Rick Kosterman and Seymour Feshbach, “Toward a Measure of Patriotic and Nationalistic Attitudes,”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10, no. 2, 1989, pp. 257–274.

⑨ Tim Reesens, “Globaliz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A Multilevel Analysis on the 2003 ISSP Data,” *Dutch/Belgian Politicologenetmaal Workshop*, May 2006, Hague, Netherland.

上所述，国家认同和超（次）国家共同体认同并不必然是“此消彼长”^①的关系。当这些共同体在权力、利益、信念等方面和国家保持一致的时候，个体对于它们的认同并不会和国家认同产生冲突。反之，如果这些共同体本身不能和国家和谐共处，那么个体对于这些共同体的认同就损害乃至消解国家认同。^②

（三）对现有研究的反思

从笔者掌握的文献情况来看，国外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从宏观层面、抽象层面展开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民族主义的研究，这些研究基本从规范理论角度展开；另一类从微观层面对国家认同展开研究，关注较多的是心理层面、政治态度与国家认同的关系，主要从实证理论角度展开研究。很少有研究将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结合起来对国家认同展开研究。

国内学界对于国家认同的讨论虽然起步较晚，但从数量上看已经较为丰富。令人遗憾的是，大多数文献偏重于规范理论的探讨，缺乏实证理论的构建和检验。由于国家认同的内涵、意义和影响因素较为复杂，所以在仅有逻辑推理而没有经验证据的情况下，不同观点各说各话，而读者也无法判断不同理论的解释力。譬如，有作者认为全球化背景下，国家认同的削弱伴随着“亚国家共同体意识”和“世界公民”意识的增强。与此同时，全球化对国家认同的挑战源自国家内部治理的失败，因此，强化国家认同的出路在于提高国内民主治理的绩效。^③遗憾的是，笔者在既有文献中没有发现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另有文章强调强化国家认同的根本出路在于培育公民人格、树立宪法权威、完善社会保障、构建协商民主机制以增强国家认同，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此观点同样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持，其中的因果关系尚不明确，结论似是而非，因为全球化很可能并非导致国家认同退化的原因。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全球化和国家认同可能受其他因素影响，譬如现代化的共同后果，也即现代化和后现代化可能是既导致了全球化的出现，也导致了国家认同的下降，而全球化与国家认同只是表面看起来负相关但事实上不存在因果关系。

也有少数国内学者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但基本上局限于微观数据，缺乏宏观层面的比较和分析。此外，一些重要的变量（譬如心理人格）尚未进入国内学者的分析框架。更为重要的是，大多数文献并没有区分国家认同在不同

① 马得勇：《国家认同、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近期国外实证研究综述》，《世界民族》2012年第3期，第13页。

② 王卓君、何华玲：《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认同：危机与重构》，《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第19页。

③ 王卓君、何华玲：《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认同：危机与重构》，《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第21、23页。

层面的影响因素,也即他们直接假定了各类因素在整体和个体层面对国家认同的影响是相同的。笔者认为,尽管一个国家的宏观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结构可能会对个体的国家认同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但其所产生的影响并不能完全化约为个体层次的变量间关系。不仅如此,一国的宏观结构因素对该国国家认同的影响也并不仅仅体现在微观的个体层次,它也会同时反映在该国国家认同的整体水平。譬如,在一个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某种宗教会从整体上增进该国的国家认同水平,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微观的个体层面该国的宗教信仰与国家认同之间存在很强的因果关系。又比如,一国的民主发展可能会消解个体对国家机器的依赖,因而导致该国的国家认同整体水平偏低,但公民对民主状况的良好感知又会增强其国家自豪感,从而在个体层面上,民主运行绩效感知与国家自豪感之间存在正向的因果关系。如果不区分民主对国家认同在不同层面的影响,那么就很可能得出自相矛盾的结果。

二 研究设计

(一) 研究思路与数据来源

在对文献进行梳理和分析的基础上,笔者渴望在本文中同时考察国家认同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影响因素。微观层次的变量关系往往是宏观层次变量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基础和前提。例如,有观点认为,宏观的国家层次上全球化导致了国家认同的衰退,即,全球化水平越高的国家其民众的国家认同水平越低,这一观点成立的前提是在微观层次上,个体对诸如“世界公民”的认同与对国家的认同之间必须存在负相关,否则就不能认定是全球化导致的国家认同衰退。因此,本文将要分析的数据也包括以国家为样本的宏观数据和以个体为样本的微观数据。本文宏观层面的数据主要来自“民主跨国数据”(Democracy Corss-national Data)的最新公开资料。该数据库由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皮帕·诺里斯(Pippa Norris)组织收集,整合了世界银行、自由之家、世界价值观调查等不同信源的多项指标。本文采用的第四版数据库发布于2015年秋季^①,涵盖了193个国家/地区的近3000个指标。这些指标既包括各国在宏观层面的客观情况和公开数据,也包括个体测量得分在国家层面的汇总(譬如均值)。

本文微观层面的数据主要来自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 WVS)项目的最新公开资料^②。世界价值观调查由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发起并主持,至今已有近40年的历史。本文主

^① 参见 <https://www.pippanorris.com/data/>。

^② 参见 <http://www.worldvaluessurvey.org/WVSDocumentationWV6.jsp>。

要采用其第六波调查数据，该数据库时间跨度为 2010—2014 年，覆盖 60 个国家/地区的近 9 万个样本，调查问卷全面考察了受访者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价值观和具体态度，同时提供了受访者的基本信息。

在本文中，第六波世界价值观调查涵盖的国家将作为样本进入宏观层面的实证研究，而第六波世界价值观调查采集的所有个体样本都会进入微观层面的实证研究。

（二）变量、赋值与假设^①

1. 宏观层面^②

根据对既有研究的梳理，笔者认为在宏观层面，有如下一些变量可能与国家认同相关：政治体制、经济发展（人类发展）、宗教态度（世俗价值观）、全球化水平、族群分化。

国家认同：本文中各国的国家认同整体水平的测量指标来自世界价值观调查。由于该调查中国家认同变量只有 5 个选项，而选择“骄傲”和“非常骄傲”的受访者占到了样本的近 90%，对该变量求取平均数后各国的差异并不明显，这很可能是因为在回答这类问题时绝大部分受访者都会面临社会期望问题。因此，笔者仅将选择“非常骄傲”的受访者在所有受访者中所占的比例作为宏观的一个国家的国家认同的指标。

政治体制：是否为民主体制对于国家认同可能存在影响，因此本文将一国政治体制的民主程度视为影响国家认同的潜在因素。目前学界、舆论界对民主能否测量、如何测量等问题仍然众说纷纭，本文无意就此展开详细分析，因此直接沿用了学术界认可度较高的自由之家对各国民主程度的评分。笔者采用 2014 年的数据，重新编码后，该变量赋值越大表示该国越民主。

当然，任何基于统一标准的外部测评无法反映各国民主形态的复杂性。因此，我们也有必要考虑民众本身对所在国家民主制度的评价。在本文中，笔者综合考察了民众对自己国家民主和人权情况的评判，最终通过均值计算得出了各国整体的“民主制度绩效”，该变量赋值越大表示该国政治体制得到人民的评价越高。

与此同时，不同的政治体制也会孕育不同的政治价值。一般认为，民主是实现社会公正的手段。因此，如果一国的民主成熟而稳固，那么其人民应当普遍承认和信仰基于社会公正的政治价值。而这种普遍的价值观很可能也会和国家认同发生互动。在本文中，笔者通过均值计算得出了各国整体的“公正价值观”，该

① 变量对应的问题和选项表述同时参考了英文版数据库和中文版问卷。

② 本节的部分变量来自微观数据的汇总，微观层面变量的赋值和计算方法详见下节，在此不再赘述。

变量赋值越大表示该国民众对社会公正的信仰越强。

经济发展：发展是当代世界的时代主题，也是绝大多数国家和绝大多数人民追求的目标和期盼的愿景。经济发展使得人们摆脱了原有的低下的生产和生活水平，摆脱了愚昧和野蛮的生存观念和文化，进而为科学、自由、平等和民主奠定了基础。“二战”以来，世界经济高速发展，很多国家也因此发展出了高度复杂的文明形态，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丰裕的物质财富，提高了人类的生活水平，延长了人类的寿命。不难发现，伴随着经济发展，个体对于包括国家认同在内的集体认同很可能也会发生变化。因此，本文将经济发展与国家认同的关系也列为分析和探讨的内容。在本文中，笔者首先选取了最为常用的经济指标——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测量经济发展的变量。^①与此同时，笔者也考察了更为复合的指标——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DI），该变量重点测算了各国人民的预期寿命、教育水平和生活质量，较为全面地反映了经济发展的结果。^②

宗教态度：宗教信仰本身就是国家认同的一个重要来源，因此，宗教在一个国家中的地位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该国汲取认同的能力。与此同时，宗教信仰与世俗化是一个问题的两面。诺里斯和英格尔哈特认为，驱动人们信仰宗教的关键因素是个体对自身身体的、社会的脆弱性和个人风险的感受。当现代化为人类创造出充裕的物质生活条件和自由行动的空间，也为世俗化奠定了物质基础，信仰宗教的驱动因素就会减弱。因此，世俗化意味着宗教信仰的退化。^③如果该理论正确，那么宗教信仰和世俗化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很可能是相反的。因此，本文将分别考察人们对宗教重要性的认知与国家认同、人们世俗化观念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因变量国家认同，笔者直接从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中提取了各国受访者认为“宗教很重要”的比例。与此同时，笔者直接沿用了诺里斯和英格尔哈特测算的世俗价值观指标，该变量赋值越大表示该国世俗价值观越强。

全球化：国内的研究倾向于将全球化看作国家认同退化的原因。为此，本文将从实证角度对这一问题展开分析，笔者直接沿用了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发布的全球化指数（包含经济、社会、文化三个维度），该变量赋值越大表示该国全球化情况越好。

族群分化：在多族群国家中，国家认同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支配族群成员的族群认同，而从属族群成员的族群认同则会对国家认同产生负面影响。在此基础

① 本文选取了各国 2014 年的 GDP 数据，为了方便统计，笔者对该变量进行了对数处理，变量赋值越大表示该国经济发展越好。

② 本文选取了各国 2014 年的 HDI 数据，数据越大表示该国人类发展水平越好。

③ Pippa Norris and Ronald Inglehart, *Sacred and Secular: Religion and Politics Worldwide*, 2011.

上，一个合理的推论便是，支配族群占总人口的比例越高、族群分化程度越低，族群认同转化为国家认同的效率就越高，而本文则希望为这一推论找到实证。在本文中，笔者直接沿用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阿尔贝托·阿莱西纳（Alberto Alesina）提出的“族群分化”指标。^①

2. 微观层面^②

因变量—国家认同：出于分析的便利性考虑，本文并不打算从学界常用的文化维度和政治维度来分别测量国家认同，而是采用一个单一的维度对国家认同加以测量。世界价值观调查通过国家自豪感来测量公民的国家认同^③，因此本节的因变量——国家认同将直接根据世界价值观调查变量“国家自豪感”重新编码而来。该变量的赋值为：我不是该国国人 = 1，根本不骄傲 = 2，不太骄傲 = 3，骄傲 = 4，非常骄傲 = 5。该变量数值越大，表示受访者的国家认同越强。

控制变量—性别：本文直接沿用世界价值观调查中的性别变量。经过重新编码，该变量的赋值为：男 = 1，女 = 0。在该虚拟变量中，女性被视为参照组。

控制变量—年龄：本文直接沿用世界价值观调查中的年龄变量，该变量的赋值即为其具体年龄，赋值越大表示受访者的年龄越长。

控制变量—教育程度：本文根据世界价值观调查给出的教育程度变量重新编码后，将教育程度划分为 4 个类别：小学及以下 = 1，初中 = 2，高中 = 3，大学及以上 = 4。该变量赋值越大表示受访者的受教育程度越高。

自变量—民主制度绩效：如上文所言，各国在既定测量标准下的民主程度和个体对所在国家民主制度的评价并不是一回事。某国在自由之家的测评中取得高分，并不意味着该国民众就会普遍而广泛地认同其民主制度。进一步而言，国别比较中民主程度与国家认同的关系也并不能直接反映民主制度绩效对个体国家认同的影响作用。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微观地层面面对这一关系进行检验。本文选取了世界价值观调查中受访者对所在国民主运转和人权情况的评价。根据因子分析，笔者将这两个变量合成为“民主制度绩效”。该变量赋值越大表示受访者对所在国民主制度的评价越好。

自变量—政治信任：在政治态度的研究中，政治信任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自变量。如果个体对政治机构表现出稳定的信任，那么他对自己的政治生活和所处的政治环境基本满意，因此就会表现出更为积极的政治态度。基于此，本文同样

① Alberto Alesina and Eliana La Ferrara, “Who Trusts Other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 85, no. 2, 2002, pp. 207–234.

② 在本节中，不知道、不予回答和其他无效回答均被定义为缺失值。

③ 马得勇：《国家认同、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近期国外实证研究综述》，《世界民族》2012 年第 3 期，第 19 页。

希望在国家认同这一政治态度变量中找到政治信任的影响。本文根据世界价值观调查对中央政府、政党、议会的信任程度这三个变量因子合成而来。这些变量的赋值越大表示信任程度越高。经过因子分析,笔者将这三个变量合成为“政治信任”,该变量赋值越大表示受访者的政治信任越高。

自变量一收入等级:在世界范围内,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差悬殊。与此同时,普遍而均匀的富裕很难实现。在绝大多数国家,不同阶层的收入水平同样有着天壤之别。因此,如果富国和穷国会表现出差异明显的国家认同,那么富人和穷人也很难在国家认同的态度上保持一致。因此,本文同样关心个体在一国范围内的相对收入水平对其国家认同的影响。在本文中,笔者将世界价值观调查中的收入等级变量从 10 分类合并为 5 分类,该变量赋值越大表示受访者的收入等级越高。

自变量一宗教信仰:宗教身份和公民身份都可以汲取个体的认同并影响个体的态度和行为。因此,在共同体建构或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宗教信仰对国家认同的影响力应当可以直接从微观层面累积到宏观层面,或从宏观层面渗透到微观层面。然而,无论国家如何对待宗教,其公民的宗教信仰和国家认同仍然不可避免地存在分化。事实上,世俗国家从不缺乏传教士,宗教国家也不难找到无神论者。那么,个体间宗教信仰的差异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个体的国家认同呢?本文尝试在微观层面检验这一关系并将其与宏观层面的关系进行比较。在本文中,笔者直接沿用世界价值观调查中的宗教重要性变量。该变量赋值越大表示受访者的宗教信仰越虔诚。

自变量一后物质主义:根据英格尔哈特的经典理论,安全、富足、稳定的生活会孕育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在这种情况下,个体逐渐摆脱生存焦虑和对国家、集体的依赖,思想更为开放和自由。后物质主义理论是可能支撑经济因素和国家认同间关系的一种具体机制,与此同时,笔者也希望直接检验后物质主义与国家认同间的联系。在本文中,笔者直接沿用世界价值观调查中的后物质主义量表指数。该因子赋值越大表示受访者的后物质主义越强。

自变量一公正价值观:大多数逻辑自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观念最终都指向社会公正,现实中的政治体制和制度安排也大多以社会公正为目标。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个体对社会公正的信仰直接反映了他对当代政治生活的理解和接受程度。在此基础上,笔者推断,作为意识形态终极目标的社会公正和作为具体政治态度的国家认同之间应当存在某种不容忽视的联系。在本文中,笔者选取了世界价值观调查中受访者对于“失业救济”“收入平等”“税收调控”“妇女权利”等问题的态度,并将这些变量合成为“公正价值观”因子。该因子赋值越大表示受访者的公正价值观越强。

自变量一传统文化:如上文所言,个体国家认同的形成过程中既有当下理性

选择的因素，也有长期文化浸润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一个合理的推论便是，本土的、传统的、主流的文化浸润有利于个体国家认同的建构，而外来的、现代的、小众的文化则会起到反作用。因此，笔者将个体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也纳入微观层面的考察。在本文中，笔者直接沿用世界价值观调查中的传统文化变量。该变量在问卷中的题目为“有一些人把注重传统，遵从家庭/宗教传承下来的习俗看得非常重要，您觉得自己和这些人相像吗？”该变量赋值越大表示受访者与问卷表述越像，也即受访者受传统文化影响越深。

自变量一威权人格：国家认同很可能存在一定的心理根源，而威权人格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指标。威权人格最早由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等学者提出，指向一种迷信、刻板、守旧、反智的心理人格。^①鲍勃·奥特迈耶（Bob Altemeyer）则将威权人格细分为对权威的服从、对不服从者的批判和对传统价值的坚守，并由此发展出了右翼威权人格（Right-wing Authoritarian, 简称 RWA）量表。^②结合威权人格的定义和问卷中变量的实际情况，笔者重点关注对权威的服从。经过探索笔者发现，世界价值观调查分别询问了受访者对于“尊重权威”“强有力的领袖”“民众服从统治者”等表述的认同程度。重新编码后，这些变量的赋值越大表示受访者越认同这些表述。通过因子分析，笔者将这三个变量合成为“威权人格”。该因子赋值越大表示受访者的威权人格越明显。

自变量一世界公民：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单纯地将自己局限为某国的公民，而是将自己看作地球村的一分子或“世界公民”。这种新的身份认同对个体的国家认同会产生何种方向、何种程度的影响呢？本文试图在微观层面对这一影响进行检验。在本文中，笔者直接沿用世界价值观调查中的世界公民变量。该变量赋值越大表示受访者对于自己世界公民的身份越认同。

自变量一少数民族：支配族群（多数族群）的族群认同会强化个体的国家认同，而从属族群（少数族群）的族群认同则会和国家认同背道而驰。因此，笔者推断，族群分化不利于国家整体上的国家认同，而少数民族的身份也会对个体的国家认同产生消极影响。在本文中，笔者根据世界价值观调查中的国家和族群变量对个体的少数族裔情况进行了计算和判定。笔者分别计算出各国的多数族群（即族群变量赋值的众数）。如果受访者在国家变量中的赋值不等于众数，那么笔者就将其判定为少数民族（赋值为1）。在这一虚拟变量中，多数族群（赋值为0）为参照组。

自变量一社会信任：一般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信任、规范以及网络”，

① Theodor W. Adorno et al.,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New York: Harper, 1950.

② Bob Altemeyer, *The Authoritarians*, Winnipeg: University of Manitoba, 2006.

“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①。社会信任是社会资本的主要测量指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个体对整个社会的归属和认同。^② 笔者推断，普遍的认同会规范和约束特定的认同。因此，社会信任和国家认同间应该存在一定的联系。在本文中，“社会信任”直接根据世界价值观调查的信任变量重新编码而来。该变量在问卷中的题目为“一般来说，您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信的，还是和人相处要越小心越好？”该变量的赋值为：0 = 要越小心越好，1 = 大多数人是可信的。在这一变量中，社会信任较低的个体为参照组。

三 数据分析

（一）数据预处理

在进行具体分析之前，笔者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了检查。通过观察笔者发现，世界价值观调查提供的原始数据完整度不够理想。对于笔者关注的变量，样本的缺失情况不容忽视。对此，笔者采用多重插补的方法对数据进行预处理。具体而言，笔者以缺失较少的控制变量性别、年龄、教育作为预测变量，采用基于FCS 策略下的链式插补方法，对少数民族和社会资本进行了 logit 回归插补（见表 1），对其余变量进行了线性插补，插补共计 5 次。在后文的统计推断中，笔者将使用插补得到的全部数据集。

表 1 数据缺失及插补情况

变量名	缺失数量	缺失比例	插补前均值	插补后均值
国家认同	1487	1. 65%	4. 44	4. 44
性别	91	0. 10%	0. 48	0. 48
年龄	183	0. 20%	42. 05	42. 05
教育程度	837	0. 93%	2. 53	2. 53
民主制度绩效	9662	10. 70%	0. 00	0. 01
政治信任	9514	10. 53%	0. 00	0. 00
收入等级	3124	3. 46%	2. 71	2. 71
宗教信仰	1334	1. 48%	3. 12	3. 11
后物质主义	6848	7. 58%	2. 91	2. 91

① 罗伯特·D. 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王列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16 页。

② 参见马得勇：《东亚地区社会资本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续表

变量名	缺失数量	缺失比例	插补前均值	插补后均值
公正价值观	6167	6.83%	0.00	0.00
传统文化	2103	2.33%	4.48	4.48
威权人格	12384	13.71%	0.00	0.00
世界公民	5718	6.33%	3.00	3.00
少数民族	15736	17.42%	0.22	0.22
社会信任	2427	2.69%	0.25	0.25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二）国家认同概览

对所有样本进行统计后，当今世界 58 个国家的近 9 万个样本的分布如图 1 所示。在有效样本中，57.9% 的受访者对自己的国民身份非常骄傲，31.9% 的受访者表示骄傲，7.4% 的受访者表示不太骄傲，1.6% 的受访者表示根本不骄傲，1.06% 的受访者不承认自己的国民身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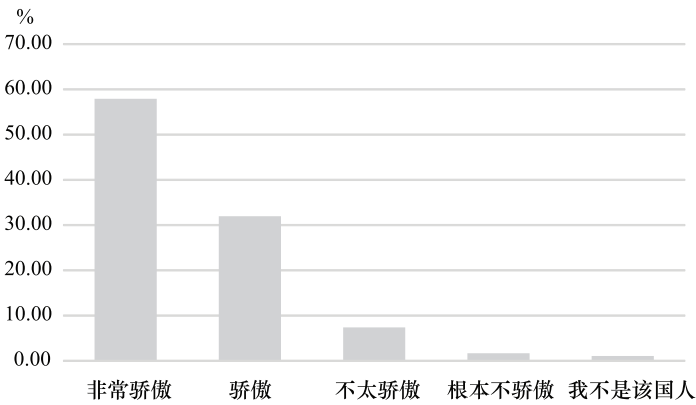


图 1 国家认同的总体分布

对样本按照国别进行分类后（见图 2），笔者发现，国家认同在不同国别的分布情况差异较大。个体非常认同国家比例超过 50% 的国家有 37 个。其中，卡塔尔表现出了最强的国家认同，98.3% 的受访者对自己的国民身份非常骄傲，另有 1.4% 的受访者表示骄傲，没有任何受访者表示不太骄傲或根本不骄傲。个体非常认同本国的比例低于 50% 的国家有 21 个。其中，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国家认同总体偏低，中国大陆、日本、中国台湾、韩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均处于较低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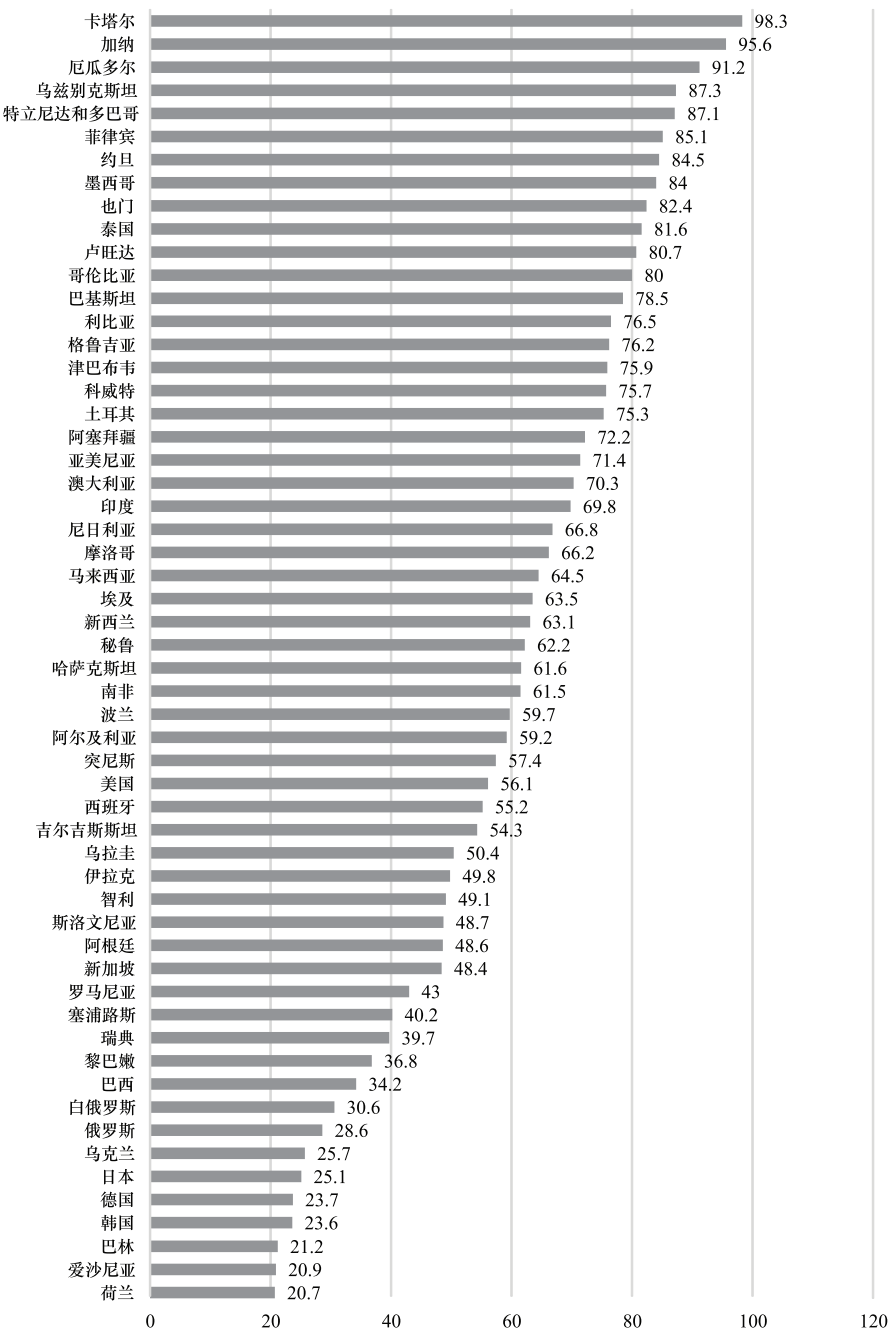


图 2 国家认同的国别/地区分布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根据英格尔哈特的文化圈分类，笔者将世界范围内的国家/地区划分为 10 个“文化圈”并分别考察了它们的国家认同情况。^① 根据国家认同从高到低的排序，这些文化圈分别为：非洲、中东、南亚、英美（Anglo-American）、拉丁美洲、中欧、天主教欧洲、原苏联地区、东亚、新教欧洲（见图 3）。类似的，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公开资料，笔者将世界范围内的国家按其主导性宗教划分为 5 种类型。根据国家认同从高到低的排序，这些宗教分别为：伊斯兰教、天主教、新教、东正教和东方宗教（见图 4）。从文化圈和宗教的分布来看，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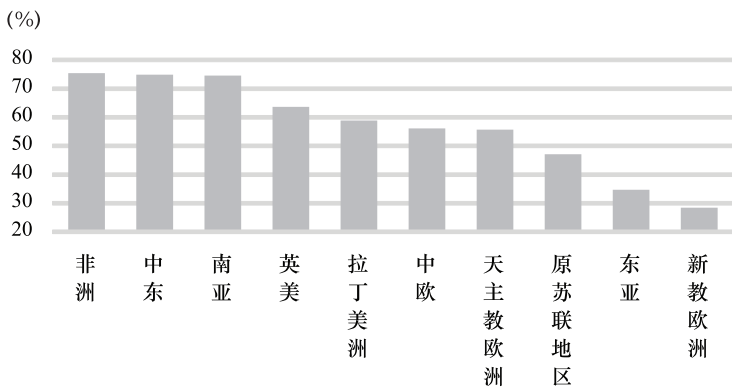


图 3 文化圈和国家认同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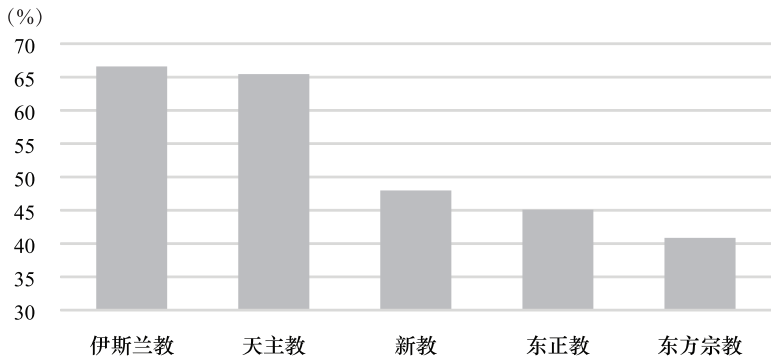


图 4 宗教信仰和国家认同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① 参见 Ronald Inglehart and Christian Welzel,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Democracy: The Human Development Seque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初步的判断就是：经济落后的地区、伊斯兰教地区国家认同水平较高；现代化程度高、经济发达的地区国家认同水平较低。

经过横向的对比，笔者大致了解了国家认同在当代世界范围内的分布情况。接下来，笔者重新回顾世界价值观调查第二波至第六波的数据，选取了数据较全的几个国家，以了解国家认同在这些国家随时间的发展趋势。如图 5 所示，墨西哥的国家认同经历了持续的增长，其他国家的国家认同虽然也有一定的波动，但大致保持平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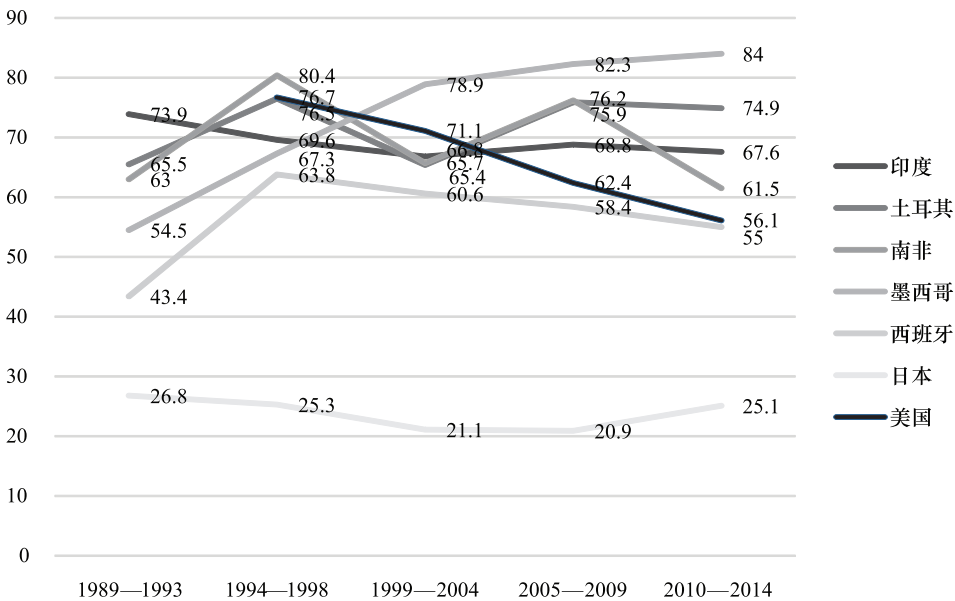


图 5 部分国家的国家认同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三）国家认同的宏观分析

在对国家认同进行初步的描述性分析之后，我们从宏观层面对国家认同与相关变量展开分析。结果显示，在 0.05 的统计显著性水平上，除了民主制度绩效和公正价值观，纳入分析的所有自变量都和国家认同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关关系（见表 2）。为了直观地展示各变量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我们使用散点图做了进一步描述（图 6—图 14）。其中，世俗价值观、政治体制、经济发展、人类发展和全球化同国家认同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也即，世俗价值观越强、政治体制越民主、经济发展和人类发展水平越高、全球化水平越高的国家，国家认同度越低。宗教态度、族群分化同国家认同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民众对宗教越重视、族群

表 2 宏观变量的相关分析

	国家认同	宗教信仰	世俗价值观	民主程度	民主制度绩效	公正价值观	经济发展	人类发展	全球化	族群分化
国家认同	1	0.681 **	-0.769 **	-0.273 *	0.075	-0.224	-0.423 **	-0.474 **	-0.474 **	0.508 **
宗教信仰	0.681 **	1	-0.827 **	-0.381 **	-0.317 *	-0.224	-0.402 **	-0.576 **	-0.562 **	0.495 **
世俗价值观	-0.769 **	-0.827 **	1	0.283 *	0.190	0.227	0.249	0.370 **	0.405 **	-0.457 **
民主程度	-0.273 *	-0.381 **	0.283 *	1	0.221	-0.044	0.347 *	0.507 **	0.502 **	-0.300 *
民主制度绩效	0.075	-0.317 *	0.190	0.221	1	-0.200	0.059	0.125	0.170	-0.002
公正价值观	-0.224	-0.224	0.227	-0.044	-0.200	1	-0.096	-0.089	0.163	-0.284 *
经济发展	-0.423 **	-0.402 **	0.249	0.347 *	0.059	-0.096	1	0.906 **	0.802 **	-0.277 *
人类发展	-0.474 **	-0.576 **	0.370 **	0.507 **	0.125	-0.089	0.906 **	1	0.781 **	-0.406 **
全球化	-0.474 **	-0.562 **	0.405 **	0.502 **	0.170	0.163	0.802 **	0.781 **	1	-0.329 *
族群分化	0.508 **	0.495 **	-0.457 **	-0.300 *	-0.002	-0.284 *	-0.277 *	-0.406 **	-0.329 *	1

注：* 表示在 0.05 的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 0.01 的水平上显著。国家数：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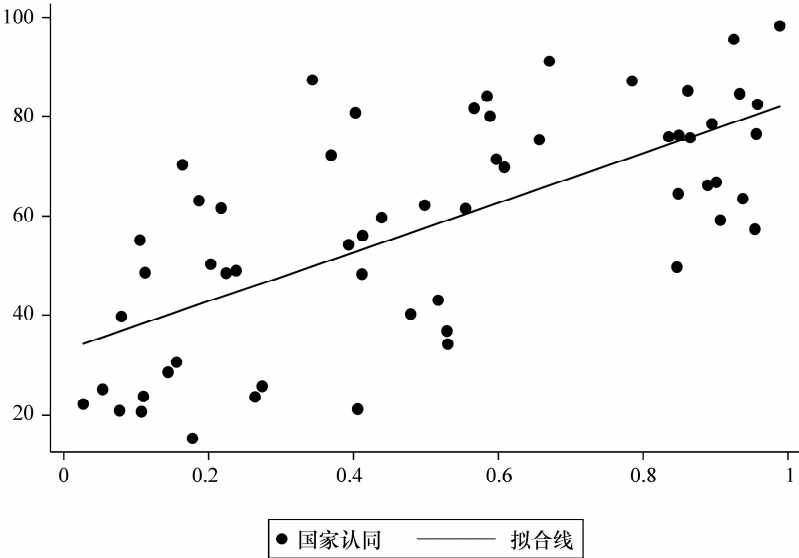


图 6 宗教信仰与国家认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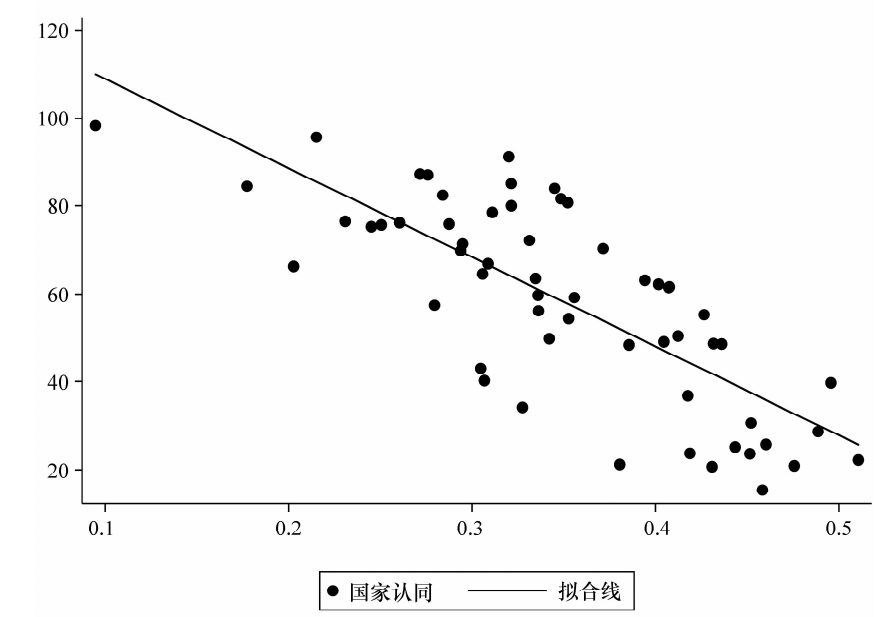


图 7 世俗价值观与国家认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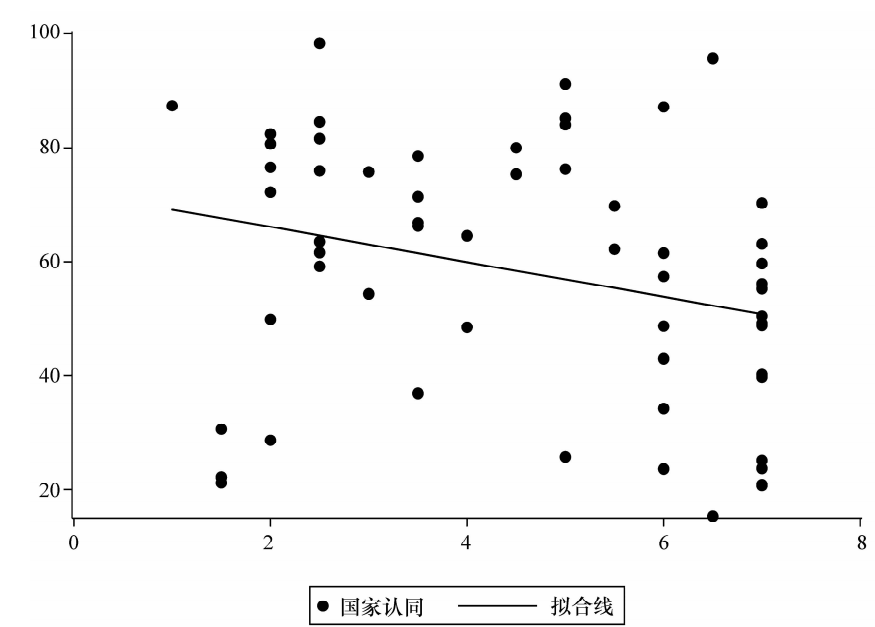


图 8 政治体制与国家认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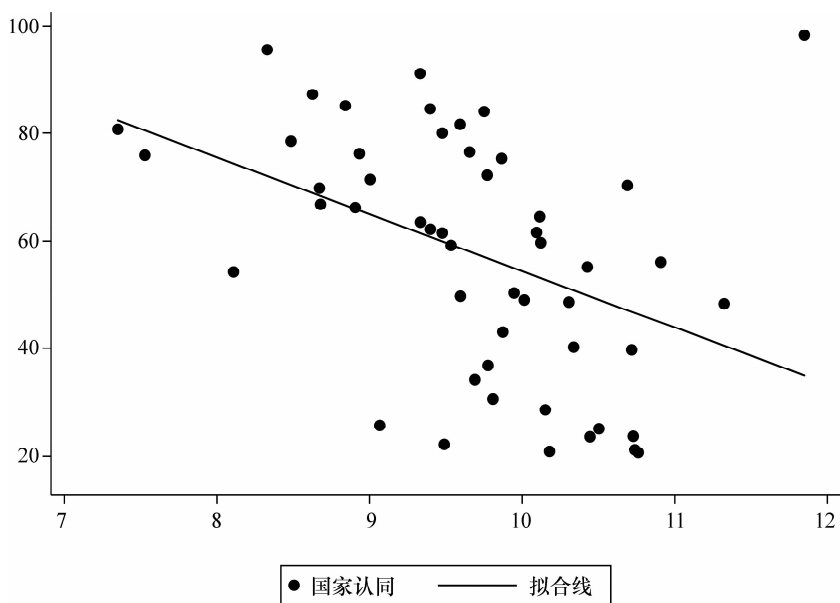


图9 经济发展与国家认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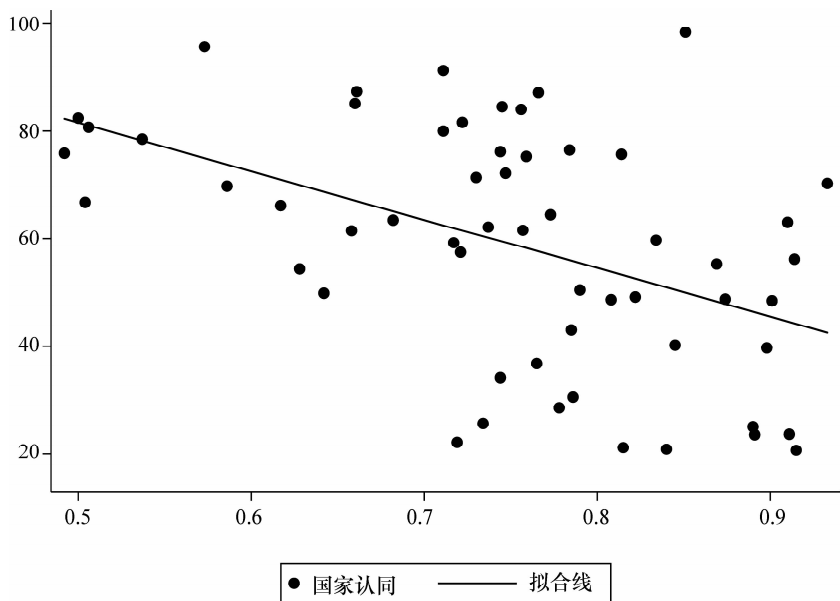


图10 人类发展与国家认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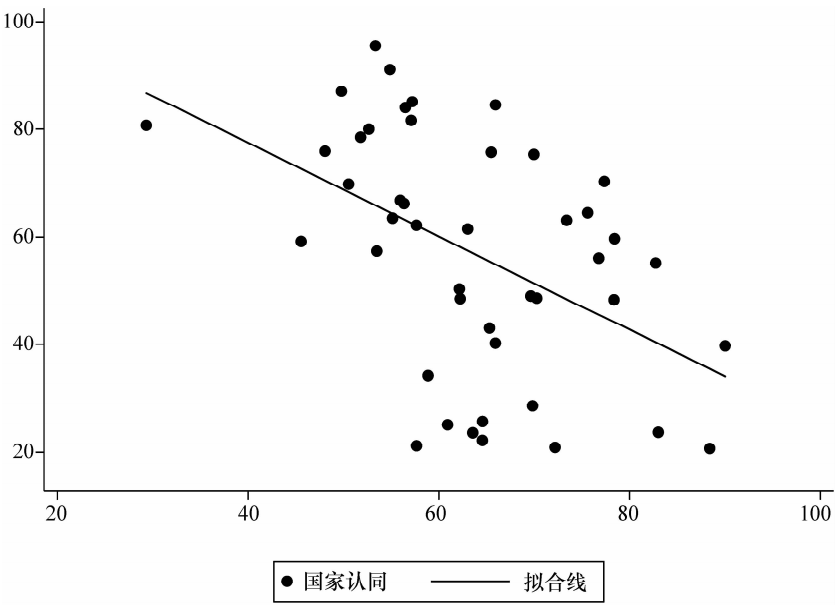


图 11 全球化与国家认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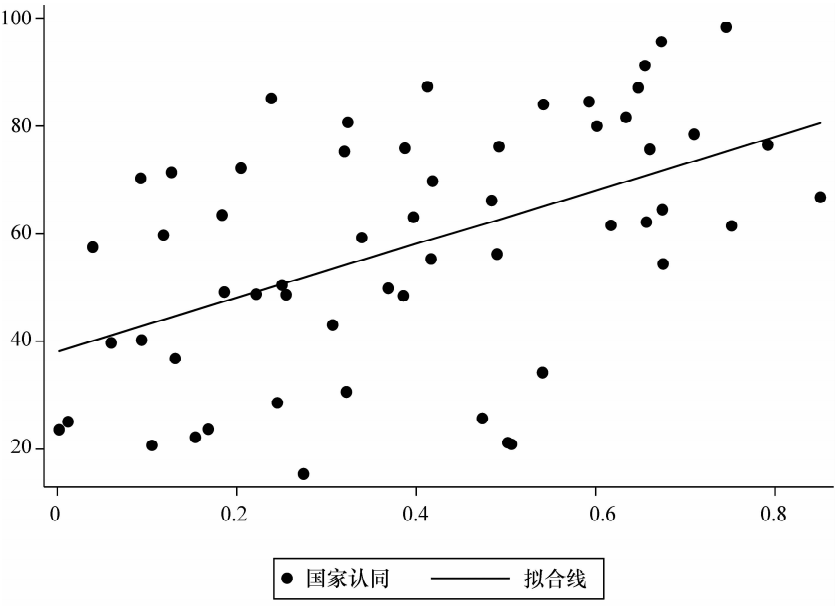


图 12 族群分化与国家认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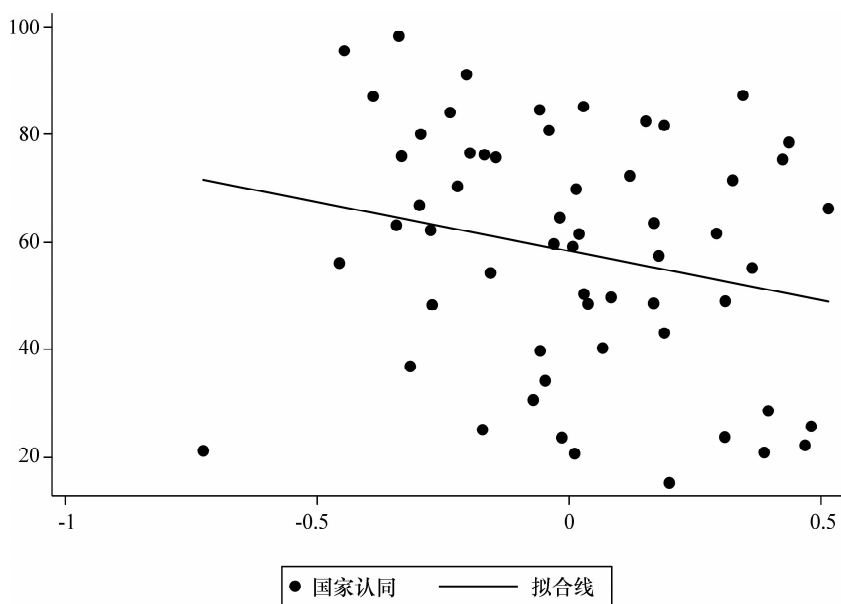


图 13 公正价值观与国家认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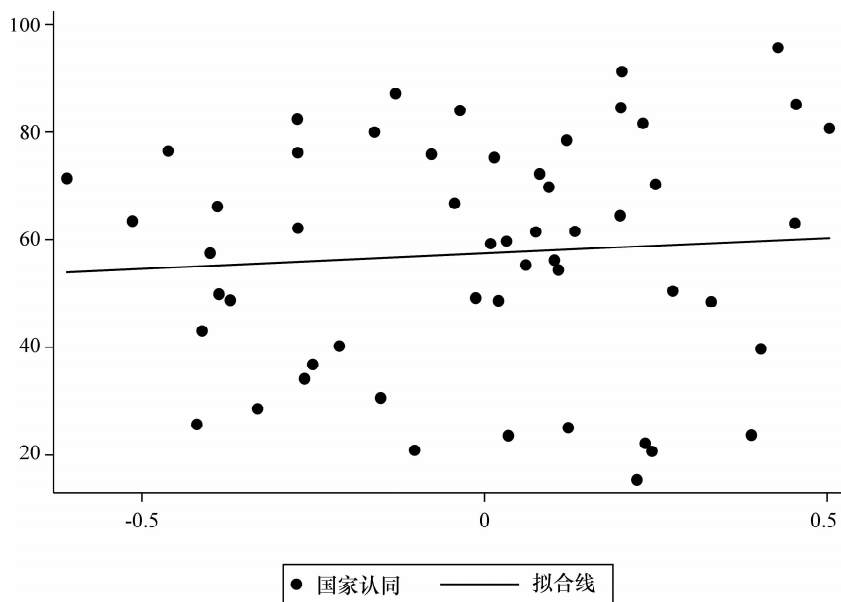


图 14 民主制度绩效与国家认同

分化越明显的国家，国家认同整体水平越高。民主制度绩效与国家认同、公正价值观与国家认同的相关关系在统计上不显著。从相关系数来看，宗教变量（世俗价值观和宗教态度）与国家认同之间的相关关系明显强于其他变量。可见，国家认同更可能是长期性的文化浸润的结果，而不是当下经济、政治或社会情况的实时反映。值得注意的是，族群分化和国家认同之间表现出了中等程度的正相关关系，这既不符合笔者的直观感受，也与本文的理论预期相悖。其中的因果关系值得进一步探究。

（四）国家认同的微观分析

根据既定的研究设计，在数据预处理的基础上，笔者将微观层面的因变量、控制变量和自变量放入回归模型。结果（见图 15）显示，该模型可以解释因变量—国家认同超过 13% 的变异。在 0.001 的显著性水平上，除了年龄，所有的控制变量和自变量对国家认同都有显著的影响（图 15 中的圆点及横线全部位于 $x=0$ 的右边即为显著的正向影响，全部位于 $x=0$ 的左边即为显著的负向影响，穿过 $x=0$ 则不具备显著性，下同）。具体而言，男性的国家认同强于女性；个体的教育程度越高，其国家认同就越弱；民主制度绩效越好，个体的国家认同就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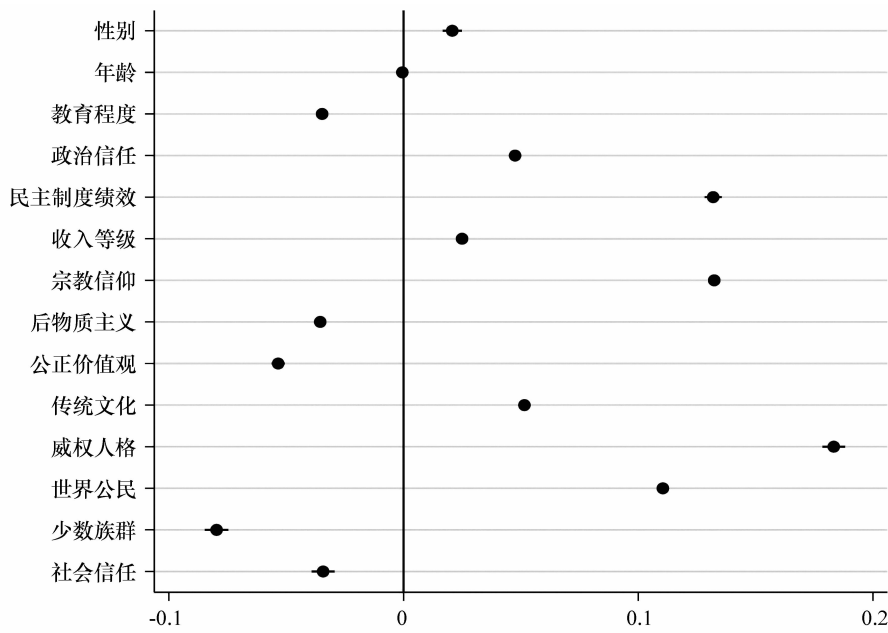


图 15 微观因素的回归分析

注：样本数 (N)：89340；决定系数 (R^2)：0.135。

强；个体的政治信任越高，其国家认同就越强；个体的收入等级越高，其国家认同就越强；个体的宗教信仰越虔诚，其国家认同就越强；个体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越明显，其国家认同就越弱；个体的公正价值观越明显，其国家认同就越弱；个体受传统文化影响越深，其国家认同就越强；个体的威权人格越明显，其国家认同就越强；个体对于自己世界公民的身份越认同，其国家认同就越强。少数民族裔的国家认同弱于参照组；强社会资本群体的国家认同弱于参照组。自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显示，宗教信仰（0.18）、世界公民（0.12）、威权人格（0.11）对国家认同的影响较强，社会信任（-0.02），收入等级（0.03），少数民族群（-0.04）对国家认同的影响较弱。

在此基础上，我们根据国家与地区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及文化圈和宗教归属，使用相同的变量分别对中国大陆、日本、韩国、印度、美国、俄罗斯、德国和伊拉克建模。如表3所示，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上，“+”表示该变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示该变量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o”表示该变量的影响不显著，空格则表示该变量缺失（虚拟变量没有参照组）。总体来说，各个控制变量和自变量对国家认同的影响在不同国家/地区中不尽相同。具体而言：

表3 各国/地区变量显著性情况

	中国大陆	日本	韩国	印度	美国	俄罗斯	德国	伊拉克
性别	o	o	o	o	o	o	o	+
年龄	o	+	o	o	+	+	+	+
教育程度	o	o	o	o	o	o	-	o
民主制度绩效	+	+	+	+	+	+	+	+
政治信任	+	+	+	+	o	+	+	-
收入等级	o	o	o	o	o	+	+	o
宗教信仰	o	+	+	+	+	o	-	o
后物质主义	-	-	o	-	-	-	o	o
公正价值观	o	o	o	o	-	o	o	o
传统文化	o	+	+	+	o	+	o	o
威权人格	o	+	+	o	o	+	+	+
世界公民	+	+	+	+	+	+	o	+
少数民族群			o	-	-		-	-
社会信任	o	o	+	-	o	o	o	+
常数	+	+	+	+	+	+	+	+
样本数（N）	2300	2389	1200	5586	2232	2488	2032	1198
决定系数（R ² ）	0.133	0.151	0.180	0.080	0.176	0.101	0.072	0.179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性别在除了伊拉克外的所有模型中都不显著,这说明这些国家/地区男性和女性的国家认同没有显著差异。与此同时,伊拉克男性的国家认同显著高于女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国的性别不平等情况。年龄在日本、美国、俄罗斯、德国、伊拉克的模型中表现出显著的正向作用,这说明这些国家个体的年龄越大,其国家认同就越强。换言之,随着代际更替,这些国家的国家认同呈现衰退趋势。教育程度仅在德国的模型中表现出显著的负面影响,这表明德国民众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国家认同就越弱。这种关系在其他国家的模型中没有得到验证。

民主制度绩效在所有的模型中表现出显著的正向作用,这说明这些国家个体对民主制度的评价越好,其国家认同就越强。当然,民众对民主制度的评价并不能作为该国民主体制的真实运行状况的衡量指标。有关民主绩效与国家认同的微观层次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研究。除了伊拉克和美国,政治信任在所有的模型中表现出显著的正向作用,这说明这些国家个体的政治信任越高,其国家认同就越强。在伊拉克的模型中,个体的政治信任越高,其国家认同就越弱;而在美国的模型中,政治信任对国家认同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些情况背后的逻辑有待进一步探索。

收入等级仅在俄罗斯和德国的模型中表现出显著的正向作用,即德国和俄罗斯民众的收入等级越高,其国家认同就越强。在其他国家,这一联系并不显著。可见用收入来预测国家认同的尝试并不稳健,笔者仍没有足够的信心来判别到底是后物质主义理论还是庇护关系理论的解释力更强。

宗教和价值变量在各个模型中的表现较为复杂。在日本、韩国、印度、美国,个体的宗教信仰越虔诚,其国家认同就越强。这说明这些国家的国家认同在一定程度上起源于宗教信仰。在德国,个体的宗教信仰和国家认同负相关。在中国大陆、俄罗斯和伊拉克,个体对宗教的重视程度与其国家认同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与此同时,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在中国、日本、印度、美国、俄罗斯的模型中表现出显著的负向作用,而公正价值观则仅对美国民众的国家认同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

类似的,日本、韩国、印度、俄罗斯民众的国家认同和传统文化联系密切,而其他国家则无法观察到这种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分析结果可能意味着在个体层面,宗教信仰、传统文化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可能受到具体情景(context)的影响,也可能受到宏观结构性因素的影响。

威权人格在多数国家表现出显著的正向作用,即个体的威权人格越高,其国家认同就越强。这无疑说明,在很大程度上,个体的国家认同有着稳定而深厚的心理根源。遗憾的是,这种联系往往被政治学家所忽略。

除了德国，世界公民在其他所有模型中都表现出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在这些国家的个体认知中，国家认同和世界公民认同是一种互相强化的关系。而在德国，世界公民认同和国家认同则很可能表现出更为复杂的张力关系。这很可能是由于德国积极推动全球化而导致国内部分民众承受负面影响的结果。

少数族群的影响情况基本和全样本模型相符，而社会信任的统计结果则在一定程度上与全样本模型矛盾。在韩国和伊拉克，强社会资本群体的国家认同显著强于参照组。而对于印度而言，这一联系则由正转负。在其他模型中，强社会信任群体和弱社会信任群体的国家认同没有显著差异。

四 研究发现

（一）微观与宏观的差异

在既有的文献中，本文采用的大多数自变量已经进入了前人的模型，因此笔者的很多实证结果都和既有文献一致，在此不再赘述。然而，将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并从不同层面加以考察后，笔者又有了一些新的发现。具体而言：

首先，在微观层面，民主制度绩效对个体的国家认同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宏观层面，整体的国家认同和该国的民主程度呈现出一定的负相关关系，但整体的民主制度绩效却和国家认同没有显著联系。这很可能意味着，无论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的真实民主程度如何，执政者都会宣传两种相互联系的合法性证明：政权来自人民和政权代表人民。进而这种官方的宣传就会在个体层面为民主制度绩效和国家认同建立联系。与此同时，相比于独裁国家和威权国家，民主国家往往处于更为和平和更多合作的环境中，民众的思想观念的自主性更强，没有必要过分依赖国家及其领导人，也没有必要刻意动员国家认同乃至民族主义。因此，从宏观层面来看，民主国家的国家认同往往会低于独裁国家和威权国家。

其次，从全样本的分析结果来看，收入等级对个体的国家认同产生了正面的影响，但是在分国家的统计分析中，这一影响大多时候并不显著。这可能意味着个体收入水平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受到国家宏观因素的影响。在宏观的国家层次，国家认同和该国的经济发展呈现出一定的负相关关系。这很可能意味着，庇护关系理论更适用于解释国家认同的个体间差异，而后物质主义价值理论则更适用于从整体上解释国家认同在国家间的差异。

再次，世界公民的认同感对个体的国家认同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在宏观层面，整体的国家认同和该国的全球化程度呈现出一定的负相关关系。这很可能是因为在个体层面，对国家的认同和对世界的认同共同源于人类的集体认同心理，也即国家认同和世界公民的认同只是相关而非因果。同样，全球化与国家认

同在宏观层面的关系很可能也仅仅是相关而非因果，它们可能是其他第三个原因引发，比如现代化或后现代化，或者由现代化和后现代化引起的价值观念的转变。

最后，在个体层面，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低于主体族群；在宏观层面，整体的国家认同和该国的族群分化程度呈现出一定的正相关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世界政治中民族—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笔者推测，在族群分化明显的国家，执政者会主动采取宣传教化、组织动员、转移仇恨等多种方式来增强国家认同，这种政治策略可能增强了这些国家的民众对自己国家的自豪感。而在族群分化不明显的国家，国家认同并不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社会问题，国家和执政者不必刻意采取措施强化国家认同，因而人们的认同感反而更低。

综上所述，本文的实证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政治学视域内宏观因素（结构、环境、情境等）和微观因素（行为者、特质、观念等）间的复杂关系。对于国家认同而言，同一类别的变量在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影响可能保持一致，也可能背道而驰。这一方面凸显了科学研究中规避“生态学谬误”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无疑说明，对于真实政治世界的探索和理解绝不能停留在对变量间关系的简单描述，而需要用不断完善理论来统合这些看似冲突的表象。

笔者认为，这些因素在宏观和微观层面的不同表现可能是由国家认同的本质决定的。如前文所言，国家认同是通过和“他者”的比较而存在的。在宏观层面，对于经济发达、全球化程度高、族群分化不明显的民主国家而言，“他者”往往意味着双赢的合作伙伴；而对于经济欠发达、全球化程度低、族群分化明显的独裁国家和威权国家而言，“他者”往往意味着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领域的敌人。敌人比朋友更能显示出彼此的不同，进而产生更为强烈的国家认同。在微观层面，高收入、民主制度绩效、世界公民意识、主体族群身份无疑能给予个体更多的信心来直面与“他者”的比较。

（二）国家认同的心理根源

心理学家认为，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都是国家认同的具体表现，而他们都起源于个体在幼年时期的“团体忠诚”（group loyalty）。^① 根据认知发展的一般规律，个体在成长的过程中会逐渐将注意力从自身转移到对自己重要的人之上^②，

① Daniel Druckman, “Nationalism, Patriotism, and Group Loyalty: A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38, no. 1, 1994, pp. 43–68.

② Jean Piaget, *The Moral Judgment of the Child*, Glencoe: Free Press, 1965.

从而产生对他人和社会的亲 and 性。^① 在这一过程，对权威的绝对服从会打破常识、道德对团体忠诚的约束。政治心理学往往使用威权人格来测量这种绝对服从，本文也沿用了这一做法。既有研究同时发现，威权人格高的个体会拒斥与自己既有立场相悖的信息，因此会反复强化自己的固有态度。^② 这就意味，威权人格高的个体一旦在早年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形成国家认同，那么这种政治态度就很难被改变或重塑。因此，威权人格对国家认同的影响非常深远。

笔者的实证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这一观点，个体的威权人格对其国家认同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我们还发现，与威权人格相联系的一些外在表现，譬如宗教信仰和传统文化也对国家认同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从目前的实证结果来看，我们无法判断这三个自变量的相互关系和先后顺序。然而按照心理学的一般逻辑，个体的人格特质先于其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③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将威权人格视为国家认同的一个重要的心理根源。

值得注意的是，威权人格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偏见、歧视和排外^④，基于国家认同的民族主义则往往预示着强烈的战争倾向。^⑤ 而宗教信仰则很可能成为联结态度和行为的纽带，进而推动战争倾向成为现实。因此，威权人格通过国家认同和宗教信仰对战争行为的双重催化作用值得我们深思和警惕。

（三）国家认同的多重路径

如上文所言，政治、经济、文化、其他共同体等多种因素都会在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对国家认同产生影响，笔者的实证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这一观点。笔者进一步发现，不同因素对不同国家、不同个体的显著性和影响力也有所不同。从微观层面来看，部分因素在某些国家的模型中对国家认同的影响不显著，而有的因素会在不同国家的模型中表现出完全相反的作用。与此同时，这些变量累加起来对各国民众国家认同的解释力也有所不同（韩国高达 18%，而印度则不足 8%）。这种情况可能意味着个体对国家的认同受到了宏观的历史、文化、宗教、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对国家认同的分析不能不考虑

① Arthur Gladstone, "Relationship Orientation and the Processes Leading toward War," *Background*, vol. 6, no. 1/3, 1962, pp. 13–25.

② Herbert L. Mirels and Janet B. Dean, "Right-Wing Authoritarianism, Attitude Salience, and Beliefs about Matters of Fact,"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27, no. 6, pp. 839–866.

③ Brad Verhulst, Lindon J. Eaves and Peter K. Hatemi, "Correlation not Caus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ality Traits and Political Ideolog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6, no. 1, 2012, pp. 34–51.

④ Chris G. Sibley, Andrew Robertson and Marc S. Wilson, "Social Dominance Orientation and Right-Wing Authoritarianism: Additive and Interactive Effects,"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34, no. 2, 2013, pp. 277–284.

⑤ Seymour Feshbach, "Individual Aggression, National Attachment, and the Search for Peace: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Aggressive Behavior*, vol. 13, no. 5, 1987, pp. 315–325.

该国的宏观结构性因素而仅仅从微观层次去分析,也不能依据一国的研究就轻易得出一个普遍性的结论。

五 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跨国比较,对国家认同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索性分析。根据分析结果,笔者发现国家认同在不同文化圈、不同现代化程度的国家存在较大的差异。在一些宗教信仰人数较多、信仰程度较深,同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 and 地区,国家认同的水平更高。例如,传统的伊斯兰教地区同时又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非洲、中东地区,国家认同水平最高;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高的欧洲新教国家、儒家文化圈国家、前共产主义欧洲国家,国家认同水平普遍偏低。可以看到,一国的世俗价值观水平越低、宗教重视程度越高,那么该国的国家认同水平也就越高。同时,笔者也发现,政治体制的民主化水平与国家认同水平之间存在统计上的负相关。尽管相关程度不算很高,但这至少表明政治体制的民主化并不会提高反而会降低一国的国家认同水平。通过宏观国家层次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化与国家认同存在着较强的负相关,而微观层面上,世界公民感更强的人反而是国家认同感更强的人。然而,无论是宏观层次的负相关还是微观层次的正相关,这种相关关系未必意味着因果关系。国家认同的下降和全球化的增加很可能都是现代化、后现代化的结果而已;而世界公民意识和国家认同意识很可能都是某种社会心理或集体认同动机驱动下的表现。因此,那种认为全球化导致国家认同危机的观点在逻辑上难以自洽,在事实上缺少证据。

本文微观层面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宏观层面的若干分析结论。整体而言,国家认同的文化宗教属性仍然强于其政治属性。那些认为宗教很重要的个体对国家的自豪感也更高;威权价值观、传统观念更强的人国家认同度也更高。如果说现代化意味着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世俗观念的普及、宗教观念的退化、传统文化和威权价值观的退化以及政治文明程度的提高,后现代化意味着人类在物质充裕的基础上,人类的价值观从“生存价值观”(survival values)向“自我表达价值观”(self-expression values)的转变^①,那么国家认同的观念实际上与这一过程背道而驰。这可能意味着,对于那些尚处于经济社会现代化和政治文明发展道路上的国家,以及已经步入发达或者后现代社会的国家,国家认同的衰退将不可避免。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一国民众的国家认同水平低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存在国家认同危机或者会引发分离主义运动。例如,日本、韩国、德国、爱

① Ronald Inglehart and Christian Welzel,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Democracy: The Human Development Sequence*, 2005.

沙尼亚和中国均处在国家认同度较低的水平，但国家分离主义的形势却存在很大差异。一国发生国家崩溃或者分离主义运动的原因十分复杂，该国民众的一般性的低国家认同可能并不是导致国家崩溃或国家分裂的主要原因。这一推论至少对一部分国家来说是成立的。那么，不同的国家，国家认同的生成原因是否相同？为什么有些因素在有的国家对国家认同的影响是负面的而在有的国家却是正面的？国家认同的衰退在政治领域的后果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仍需要进一步研究。

从规范层面对国家认同的学理性分析基本源于欧美学者，他们的研究大多基于对西方国家的历史与现状的思考，很少考虑不同文化、宗教、历史和政治体制的差异性，其局限性显而易见。国内不少学者对国家认同的分析实际上并未摆脱这种规范研究的思维范式。基于这种研究范式，他们主张可以通过体制的民主化、提高民主治理绩效、增加经济激励等措施以增强公民的国家认同感进而解决国家认同危机的建议似乎过于天真和想当然。本文以全球 50 多个国家的跨国比较实证分析结果并不支持这些观点。这些观点对我们理解国家认同的本质及其发展趋势帮助有限，甚至会造成误导。从全球范围来看，国家认同的内在属性、生成原因和变迁驱动力等问题极其复杂，各国差异很大。对于国家认同问题的诸多困惑和疑问，本文只是提供了若干基本事实，对一些错误认识提出了质疑，并未提供太多的理论解释和政策建议。但是，笔者希望本文能够抛砖引玉，成为国内相关研究的新起点，期待更多的优秀研究成果揭开国家认同的谜团。